

中国科举

Chinese Imperial
Examination

林冠夫文集

林冠夫
著

東

中国科举

Chinese Imperial
Examination

林
冠
夫
文
集

著

林冠夫

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科举 / 林冠夫 著. --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5.7

(林冠夫文集)

ISBN 978-7-5060-8337-9

I. ①中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科举制度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D69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5707号

中国科举

(ZHONGGUO KEJU)

作 者: 林冠夫

策 划 人: 张 杰

产品经理: 赵颖畅

责任编辑: 赵颖畅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册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5.625

字 数: 157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337-9

定 价: 26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弁言

本专题的内容，说的其实只是科举的几个要点，今题曰《中国科举》，似嫌过泛，较准确的说法，应称之为《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述要》为宜，文中仅叙述中国科举之要而已。

既然说的是中国科举制度中事，故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，即什么是科举，它又如何成为制度？

科举制度为古代中国一个漫长的时段内官员的资格考试制度，包括文科和武科。按其状况特点和社会作用而言，其实质应是古代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教育制度，同时亦是一项政治制度。

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，作为一项研究课题，其内容含量颇大。而这一制度本身，以及与之有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发展状况，都可以分别形成篇幅不小的专著。与此题直接相关的八股文、试帖诗、捐纳等，各自亦都可构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专题项目。以上诸多论题，如果作分头述说，甚至还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丛书系列。

然而，科举这个总题下的诸多分题，却又都互相密切关联。如若将这许多问题放在一起，将其中许多相关的细点加以细致的考察和叙述，更易于说得清楚一点，亦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。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，本专题的研究，既要有分题叙述，又不想占太大的篇幅，因此，只能将各分题联系起来，择其要者作简括的概述。

既然本专题论究的是古代科举制度，故其内容当以科举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为主，着眼点放在此一制度衍生的种种现象以及一般状况上。科举的参与者，为各个时代的文人，因而科举成为文人出仕的主要途径，由此本专题亦叙述一些文人在这个制度下的生活情形和文化心态。本专题叙述的笔墨重点，主要放在科举始成制度的唐代和距今时代最近的清代。

还须特别说明一点，本专题叙述中，除有关的文献资料外，亦多所参考采摭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其中尤须一提的是商衍鏊先生的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。商先生是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甲辰科一甲第三名进士，即通常说的探花。他自生员进学，考中举人，直至进士及第，久历文场，于八十三岁高龄回顾自身的经历，著此述录。老先生可谓是科举的个中人，亲历其事，说的都较为实际，故本专题于叙述中颇多征引。

时下一些著作大多注重某种理论的阐发，当然，探究一项历史文化现象，理论上有所阐明，无疑也是十分必要的。然而，考虑到本专题的内容系介绍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当以事实叙述为主，



末科探花商衍鎤以一部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科举史料

说明事实即可。论述其中蕴含何种理论或思想，非本专题述作的初衷。何况，各种不同内容的著述文字，叙述中各有不同的要求，毋庸一律。故本专题仅仅叙述古代中国的科举现象和过程，不采偏重理论的流行写法，亦不敢就某些阐明理论的大作说三道四。如此做法，是得是失，不能自知，更未暇计及，尚祈高明赐教也。

目次

- 一、古代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——001
 - 二、科举的特点及其奇怪顽强的生命力——014
 - 三、科举制度施行之前的文人入仕——028
 - 四、前期科举——036
 - 五、后期科举——064
 - 六、八股文——090
 - 七、试帖诗——106
 - 八、科举制度下的学校教育与儒家思想——118
 - 九、科举趣事、佳话和笑话——132
 - 十、科场案——140
 - 十一、余论：科举之外的异途——156
- 结语——164
- 后记——166

一、古代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

科举，后来发展成为制度，这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，而且为一个特定时期所独有。为什么这样说？

中国独有，好理解，国外没有者也。然而，这里说别人没有的事物，并不是为了说明天朝大国比人家高明，最早出现并不意味着最佳最美妙或最合理。即使最早出现，而且在当时又确实是最佳最合理的，也不见得会永远如此。时代在不断前进，社会现象也不可能停滞不变，也有个历史演变过程。

这本来是个好理解的问题，如中国的四大发明，当年确是最佳的事物。中国人却不应该老是以此而洋洋自得，不思进取，故步自封。对此，鲁迅曾沉痛地嘲笑过，说：火药是中国发明，中国人至今还在用于制作鞭炮和烟花，人家已用于洋枪大炮来进攻中国了。指南针是中国发明，人家用以航海，中国人却还在用以看风水，定方位。

前些年，中国人关于中外文化的观念，有些小变化。中央大国为优，四夷为劣，毕竟是古人弹的老调，后来经历了一番曲折，老调弹不下去了，于是关起门来自称老大。那关着的大门被“夷狄”以大炮轰开后，受尽了欺凌，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观念随之而发生了大

变化。

结束了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自我陶醉之后，出现两种扭曲的倾向：其一是什么都是人家的好，连月亮也是异国的圆。其二是转摆老祖宗的阔，现今虽然日子不好过，先前却是大大阔过的。鲁迅笔下的阿Q，受到欺侮时，对欺侮他的人不满，不得不在背地里说，你算个什么，老子先前比你阔得多。

阿Q毕竟是民元之际的人，摆祖宗的阔也不怎么时兴了。中国月亮不如人家的圆，这是出洋留学大潮中，当年的海归派人士的观念，如今似乎再也没有人直接这般说了，然而，其论述问题的方式又有另一套路数，不知这些人有着何种潜在的意念、思路，对某一事物作判断，往往以洋人的高下为高下。比如，说明一部论著的学术水准，动辄搬出洋人的评价，曰某国某人对此有过好评，学术上就一定高明之作，不问这位洋人为何等人物，其学术水准如何，亦不问所论述的是个什么问题。

洋人当然有其先进方面，但并非所有的说法，特别是论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，都是精准的真理。上述的这种思维方式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那仍然是紧跟于洋人身后亦步亦趋，月亮依然是人家的圆。有些人的绝对强项，永远能善于将自己叫得不响的想法掩盖起来，找到个冠冕堂皇的词语装点自己。不说以洋人的说法为准，而是叫作“与国际接轨”，中外同步。

闲话少说，我们还是回到科举问题上来。对此，也许有人会说：“科举外国也有。”随即滔滔不绝地举证外国也有学校的入学和毕业考试，以及其他多种考试，有的国家，如古代俄国，还有文官考试。无奈那都不是科举，不能说中外这些考试是一回事。中国的科

举，成为一种制度，其内容和形式，都有特殊的规定，它完全是古代中国官员的资格考试，有自己特有的内容和方式。

说中国科举是文化现象，倒好理解。因为，它的参与者都是一些文人，而其内容、过程都与文化教育相关。就其实质说，此为文化人的活动，反映一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况。因此，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，只能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，才能得其要领。

当局通过科举考试可以了解应试者即士子的文化心态，以及治理国家、处理政务的能力。因三场考试中有多份试卷，除唐宋的诗赋，明清的八股文之外，还有策论之类，可藉以表现与试者的文化水准和对国家大事的见解，这实是以文化为标准考选官员。

科举倒是一种实打实的文化，或者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成分。文化是个多含义的概念，究竟包含什么，最新派也最流行的说法，称之为人对价值观念的认知。或者说，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水准。就一个社会时代来说，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，是指人对宇宙自然、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水准，就总体而言，其含义大致与社会文明相当。

古代中国，人的自身价值，集中表现于生活理想与生活追求。中国文人的最高人生理想，按传统的说法，传不朽者有三，曰：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又其次为立言。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）立，就是有所成立，三者之中的一项为后世遵奉效法，“惠泽被于无穷”。古往今来，此三立为圣贤的要求，常人殊难做到。且不论立德、立功，便是又其次的立言，也不是写过几本著作并付刻印，便可以算数的。至于那些人云亦云，祸枣灾梨者，立言更谈不上。

常人，或一般文人，最现实也是最直接的追求，便是通过某种途径，得个一官半职，说得冠冕堂皇，便是由此可以行道，大约是指孔夫子的儒家之道。直截了当的，便是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封妻荫子，改换门庭。故历来的读书人最普遍的追求便是入仕，即进入官场，得个一官半职。

文人的入仕途径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皆有更易，其共同之点，最简明地说，就是“学而优则仕”。一千余年来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直接体现，就是在科举中考中举人、进士，从而踏上仕途。通俗的说法就是“读书做官”，也叫作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。

科举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，亦是一个皇朝的政治措施。这个制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文人的入仕。入仕因此而成为古今读书人的共同追求，而任何个人的追求，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亦取决于社会和时代的需要。

任何一个朝代，社会都是宝塔式的结构。宝塔的底层，自是千千万万黎民百姓。由此而上，这座宝塔的各个层面，都有一些治理人员，这便是由地方到省的地方官（唐宋无省一级，州府直属中央），以及朝廷的官员，主要是六部九卿及其他有关单位的官吏，由此形成等次有差的统治集团。

士子们按照规定项目，按级应考，自州府的院试，省级的乡试，直至中央的会试和廷试，一路考来，如中式合格者，逐级录取。州府级考试合格者为生员（生员入学，除贡生通过一定手续可考助教职外，不算正式入仕），省试中式者为举人，最后是国家级考试中式者为进士。通过考试的士子从此进入官场，各自成为这座宝塔不同层面上的一员。



宋赵伯驹笔下的乡试观榜图 刘晓供图

然而，科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这一制度本身有其复杂的内容。任何时代，统治集团的各级官员，都处于十分活跃的变动状态，或因为自然的缘由，如官员自身老病寿终或父母死亡须回家守制；或因为人事的关系，如在官场争斗中吃了败仗；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常见的变动，如因贪墨而受惩处，就中因诬误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罪名被罢黜者，极为常见。

这个社会的成员，为表现其存在价值，努力要进入统治集团，成为这座宝塔结构层面上的一员，占据一个位置，然后再向上攀登。其中一些人越攀越高，一直攀到臣僚的最高点，成为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”的宰相。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的从政道路。另一些人便在向上攀登的途中跌落下来，或银铛入狱，或送掉老命。人们为挤上统治集团的高层，作这番攀登，尽管宦海浮沉，波涛险恶，“伴君如伴虎”，可是仍然个个竭尽全力，营营以求。在这番攀登过程中，挤掉

他人而为自身扫清道路是自然的事情，下手狠毒，置他人于死地，在历史上酿成许多悲剧，演出过无数惊心动魄的场面。

由于上述诸多原因，这个集团的各级官吏，常会出现减员，必须不断增补和更新。汲引社会人士进入官员集团，到这个宝塔结构的各个层面上来，于社会国家，于统治集团，遂成为必要之举。而另一方面，文人士子自须通过科举寻求出路，以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。于是，社会需要与个人欲求，两相结合，相互统一。故科举制度自隋唐以还，得以代代相因，长期延续不断。

科举，作为一项制度，既是一个时代官员集团的更替补充所必须，又是古代文人求出路的主要途径。它造就了隋唐至清代晚叶一批特殊文人，出仕成为各代文人普遍的生活追求。

科举是文化现象，同时又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现象。存在科举的漫长岁月里，朝代有过多次的改换，且不说唐宋明清这些像个模样的朝代，即使是改朝换代十分频繁的时代，如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，只要是有一段短暂的承平时日，当局就要举行科举。

举凡历史上几个正常的时代，如唐宋明清，几部正史中的《选举志》，各载有明文说明这些朝代的科举状况。即使政权不断更替的短命王朝，如五代，正史中虽无《选举志》，但《五代史》的某些人物本传，亦有某些科名记载，从侧面透露这个时期的科举概况。如欧阳修《新五代史·桑维翰传》记。

（桑维翰）初举进士，主司恶其姓，以“桑”、“丧”同音。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，可以从他求仕者。维翰慨然，乃著《日出扶桑赋》以见志。又铸铁砚以示人曰：“砚弊则改而他仕。”卒以进士及第。晋高祖辟为河阳节

度掌书记。

桑维翰的科名，从他早年落第，到后来考中进士，都没有注明准确年代。但桑氏的从政时间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到出帝石重贵在位时，即公元936至946年，前后共十一年。由此可考知，他中进士的约略时间，当在五代后晋初年。又《新五代史·王朴传》谓其“少举进士，为校书郎”，亦未标明中进士的准确时间。但王



桑维翰

朴的活动时代为五代的后汉和后周之交，由此亦可推知，他中进士当亦在这段时间内。同书《扈载传》谓，扈载于“广顺初，举进士高第”。广顺是五代后周太祖郭威的年号（951—953）。上述诸人的科名为进士，此外还有一些人，史载其举进士不中。由上述记载可知，即使是几个短命王朝频繁更迭的五代十国期间，仍未停止过科举考试。

此外，与五代十国时代相近的辽代亦行科举之制，据《辽史本纪》载，自辽圣宗统和六年（988，宋太宗端拱元年）“诏开贡举，放高举一人及第”。此后，逐年有人进士及第，少则一二人，多则几十人，最多的是辽圣宗开泰五年（1016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），进士四十八人，太平八年（1028，宋仁宗天圣六年），进士五十七人。辽为北方契丹人建立的政权，占领北中国的广大地域，其施行科举，与华夏的北宋，取一致的做法。可见，无论是何种政治背景下，科举制度一样前后相续，几乎不曾间断。

明清两代，科举进入后期，与前代的明显区别，主要是八股取

士。按照当时的说法，那是从八股文章中了解考生的心术和治理国事能力。所谓心术正不正，主要是看应考者几篇阐发圣人思想的八股文作得如何，思想见地是否符合圣贤的道统，从中看作文者的思想品格。

于文章中看作者的品格，所谓文如其人，原本是文论的传统。早在宋代就记载了一则科场故事，讲南宋王应麟如何于科举文章中识别考生的人品，其预言后来为历史证实，是有名的例子：

南宋理宗时，皇帝想将殿试初定的第七名拔于第一。他还有所犹豫，便召论文名家王应麟来复阅。王应麟阅文之后，上奏曰：“是卷古谊若龟鉴，忠肝如铁石。臣敢为得士贺！”到唱名即宣布名单时，状元不是别人，正是后来名震千古的民族英雄文天祥。记载说明，文天祥的忠贞至正，铁骨铮铮，在应科举考试时，已于文章中见端倪。

王应麟于科举文章中识别文天祥，是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事实。但



明人所绘文天祥像
刘晓供图

是，古往今来在文章中如此明显见出人品人格的，并不多见，这只是个特例。唯其如此，方为世所传颂。看来，多年浸淫于圣贤之作中，品格经受后天陶冶，看来对一些人也还是起作用的。

但在多数情况下，凭科举的几篇官样文章，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术如何，是不大靠得住甚至是十分可笑的事。文化史上，文章和人品相矛盾的，亦可以举出一大堆人来。最突出的是初唐的宋之问和沈

俸期，诗都写得很好，但二人的品格都极为低下，其卑鄙无耻也是历史上少有。此后，宋代的秦桧，明代的严嵩，科举的名次都很高，可见他们科举考试的文章，当亦写得像模像样，而秦、严二人的人品却不堪之至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。

从文化史的整体上说，科举对人的生活道路和心态，影响至为深刻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，主要是影响人的文化心态。与这一制度相始终的一项突出表现，便是读书人的入仕追求，它左右着众人的思想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生。可以说，科举制度对人的影响既重大又深刻。

科举的成功者，命运顿时发生大变，正所谓“十年窗下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（元·刘祁《归潜志》卷七）。于是，这少数幸运儿的荣耀，影响了绝大多数文人的命运，许多人一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，就是读书，从而参加科举，金榜题名，进入官场。明人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卷二十二载：

相传有《四喜诗》曰：“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（一作挂）名时。”

由于此诗内容说明文人心态十分典型，因而在民间广泛传诵。诗中的前三者，都是颇不寻常，这里将此三者与科举中的“金榜题名”相提并论，足见古代中国人心目中，科举得意占据了何等不寻常的位置。

中国古代的文人，努力读书，科举取得成功，考中举人进士，即



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，写下不朽名著《聊斋志异》，书中多处反映了科举制度下士子的心态

所谓名登两榜，然后进入官场。然而，千余年来真正科场如愿的只有极少数，能做到冷眼旁观，超越这种科举求仕观念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大多数人都是科举道路蹭蹬。如《聊斋志异》作者蒲松龄，这位旷世大才，才名藉藉，十九岁便初试合格，入学成为生员。可是此后科场连遭失利，始终不能考中举人，更无论中进士了，正所谓“文章憎命”。此外还有更多的另一些人，连进科场，却始终科名无分，连入学为生员也难以如愿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，科场不利，沉沦终生。孔乙己虽非实有其人，但却是这大多

数人一生命运的缩影。

科举考试成功者永远只是极少数人，与应考的总人数相比，属于微乎其微。可是，文人一旦开始科举生涯，便欲罢不能，难以自己。有的人，此科不取，便等待下一科再考，这般一科科下来，直至年老。据载，清代有一位百岁老翁，由曾孙为他打着灯笼送进考场，便是这类不肯罢休者的代表。这当然只是少数。多数人考至六七十岁还未考中，便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，以遂自身的未了之愿。因此科举考试成功者虽少，但于此中讨生活、求出路，以了此一生者，人数却极为可观。

就整体说，旧时代几乎所有的文人，无论在科举制度下成功还是失败，他们的思想却是惊人的一致，都为社会风尚所左右，欲于科举中博得名登两榜，飞黄腾达，以改换门庭。